

《全国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模式》
课题研究参考资料之一 ~~共三册~~

中国发展研究参考资料

(下 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预测组
《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模式》课题组

一九八七年八月

社会现代化与现代伦理精神	王润生	1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的几个认识问题	王继宣	27
试论文化现代化的途经	陈燮君	45
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访李绍昆博士	陈善余	58
中国的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薛焕玉	67
中国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与教育发展战略		
毕 诚	程方平	82
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陈栋生	98
区域经济、区域规划的由来和发展	宿 良	115
试论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非经济因素	黄 克	126
论非经济调节手段	魏 杰 韩志国	138
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战略和参照原理	秦麟征	155
论协调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基本状态	宋周尧	169
试论社会协调规律	尚 泽	182
社会主义社会协调机制初探	尚 泽	192
科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波动转化规律	颜泽贤	209
议发展战略中的优势分析	松 林	213
经济社会战略发展模式初探	董文理	228
关于系统科学和跨学科研究	左兴成	238

社会现代化与现代伦理精神

王 润 生

内容提要 本文从价值取向、人我关系、人格设计和道德选择等四个方面讨论了中国社会的传统伦理精神，从而提出现代化需要一种现代伦理精神。

、马克思·韦伯在分析描述西方资本主义发生史时认为，新教伦理精神是资本主义的催生剂。这种观点虽然无论就研究对象还是就观点内容来看都是具体的、实证的，但于历史哲学也有启发价值。

我们不是文化决定论者，当然更不会把某种伦理文化当作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因。但是，历史是由多种貌似无序的力量组合成的合力推动的，恩格斯晚年强调的这一“合力论”思想至少提醒人们：在注意造成历史变迁的潜在或显现的经济原因之同时，绝不能陷于历史的单因决定论的泥坑，否则历史哲学将会成为纯书斋里的空谈，于分析现状、于实践、于预测未来均毫无裨益。

事实上，在具有伦理治国传统的中国，历史的每一次变迁，

都伴着新旧伦理精神的角逐，其激烈程度，远甚于其他领域。近百年来，在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中，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起步维艰，步履踟蹰，跌宕起伏，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至今尚未完成伦理精神的现代化。

本文试图从价值取向、人我关系，人格设计和道德选择四个方面讨论现代化所要求的现代伦理精神，以此来反省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并对近几年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作一粗线条的描述。

一、价值取向： 内在超越型还是外在超越型

价值是世上万事万物（包括自然的和人为的）以及人自身的心理倾向和外在追求对于人的意义；价值观念是人们对万事万物之意义的看法。

对同一个有价值的东西，由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背景的不同，不同的人们可能会作出不同的估价，于是形成特有的价值取向。

价值系统几乎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结构，其中有些价值取向是次生的，有些是基本的。基本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大量次生的价值的看法。比如对人性的看法。对人生意义的看

法，就是基本的价值取向，它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幸福观、金钱观、财富观、时间观、劳动观、英雄观等等。撇开具体的文化形态，仅从心理的、经验的角度分析，人类自古以来就怀着两个古老的梦想。例如，还在两千年前的中国，人们就通过他们的思想家说出了他们的潜藏在内心的强烈渴望：一方面，人们盼望着“衣食足”、“仓廩实”的自在生活，富国、养民被一些政治家当作梦寐以求的事业目标；另一方面，在人们的理想旗帜上，又清晰地描绘着一个人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大同世界”的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为，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①

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尽管各时代、各民族的主旋律各不相同，但就价值取向而言，万变不离其宗，实质上不过是上述两个梦的变奏而已；或者求生存、求温饱；或者求平等、求和谐。

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把求生存、求温饱的价值取向称为外在超越型；把求平等、求和谐的价值取向称为内在超越型（“超越”一词的含义在此指“极致状态”）。

① 《礼记·礼运》。

两个梦都是美好的，倘若在坚实的地面上能够同时将两个梦想都变为现实，那确实是再现想不过的人生境遇了，我们也就不再有就此做文章的必要。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历史却常常迫使人们去作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

正是因为这种价值间的冲突，作为部分原因导致了各民族、各时代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就主流文化而言，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属内在超越型。

从思想史上看，内在超越型价值取向的确立首先同孔子有关，尽管他有些议论还不太极端（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也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②，但真正对中国千百年来的社会决策和民众文化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他的下述议论：“均产相安”、“安贫乐道”、“重道轻食”、“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③这些议论加在一块，就形成了一个初具典型的内在超越型的价值逻辑：只要有了平等，有了和谐，大家相安无事，贫也就不再显得贫了。

虽然千百年来在中国的土地上也产生过功利主义的呼声，

② 《论语·里仁》。

③ 《论语·季氏》。

但很微弱，相比之下，老庄哲学和佛教倒更有市场些。佛教主张出世，主张“四大皆空”，主张通过对现世生活一无所求的心境去找到灵魂的庇护所，找到永恒；这一点尽管与儒教的“济世”思想有别，但在制欲、寡欲、禁欲这个层面上是相近的。老庄主张无为，主张顺应自然，消心寡欲，外化而内不化，无论交牛交马，生老病死，由它去（“外化”），由此获得精神上超脱的宁静和自由（“内不化”）。因此，为了避免纷争，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理想，“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庄子主张弃绝一切物质上的进步，“返朴归真”，理由是技术的发明运用，会使人民变得乖巧，有损“淳朴之心”，即所谓“有机械必有机心”。可见，在终极价值目标的选择上，老庄同儒教也相近。

于是，东方文化就这样被打上了特殊的底色：重精神，重秩序，重和谐，重道德。

终极的价值目标一旦确立，就会相应地引申出一系列直接对人的生活产生指导作用的次生的价值准则来。虽然终极目标本身是抽象的，或许选择了它的普通老百姓还有可能是不自觉的或无意识的，但是看看第二层次的价值准则，它的全民族性、自觉性和具体的丰富多样性便显现出来了：

幸福观：“知足者常乐”；

财富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金钱观：身外之物，万恶之源；

人才观：老实、厚道、驯良、听话的就是好样的；

节俭观：“修身莫过于寡欲”、“俭以养德”；

商业观：“无商不奸”；

乡土观：金窝银窝，不如家乡的土窝；

经济道德观：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道轻食、“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国家尊严观：以礼义之邦自诩；

……。

当然不应该将一个民族在价值选择上的偏差简单地归结为个别思想家的偏差，历史从来都不是教父们设计的，思想家的倡导和宣传往往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内在超越型价值取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封建中央集权在政治上的需要，另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这种选择同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吻合，因为想吃葡萄的愿望，如果完全缺乏兑现手段的话，那么说葡萄是酸的也就是自然的了。

也许是历史的惯性，也许是千百年的文化传统在民族文化心理上的积淀，也许还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当历史的车轮把中华民族带入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一方面，我们的

国家发生了伟大的革命性变化，另一方面，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跨度里，我们的梦还深深打着传统价值取向的印痕。

表面看来我们对孔夫子并不尊重，甚至这位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顶礼膜拜的圣人还曾遭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身攻击，但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幽灵却处处闪现，顽强地生存在舆论里，融合在意识形态中，物化为具体的社会决策。

例如，仅用道德尺度来衡量社会制度的优劣，理论上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决策上的“穷过渡”，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讨伐，八级工资制的名存实亡，“干不干是态度问题，干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的“唯动机论功过观”，等等，都是这种价值取向的派生物。

我们知道，面方近现代工业化的发展，离不开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开端的启蒙运动。如果分析得更深一点的话，便会发现。无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还是法国启蒙运动，无论是英国的功利主义还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其主要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们推动了面方社会的价值取向的转换：从传统的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内在超越型转换为外在超越型。

当然，这并不是说搞现代化就得连面方的模式也要全盘照搬。但是，需要一个价值取向的转换这是毋庸置疑的，否则，

我们的各项决策就会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全方位的改革也会缺乏清晰的目标模式。人们的社会心理也会同现代化的旋律大唱反调。

事实上，这几年，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起步，这种价值取向的转变已经初露端倪，兹举几例如下：

1、效益观：过去，在经济决策中，我们更多地是强调生活的逻辑，强调政治效益和道德效益；现在，在多数人的心目中，生活的逻辑大半为生产的逻辑所取代，衡量各种社会活动的尺度开始单一化和清晰化了。比如，在宏观经济学中，市场可以开放到什么程度？个体经济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企业扩权可以到什么程度？股票市场能否建立？关键都要看怎样做才能带来经济的高效益；在区域经济学中，是按照“梯度理论”从东南沿海向西北腹地逐级发展呢还是“遍地开花”？也取决于投资的经济效益；在微观经济学中，欧美的管理模式可取呢还是日本的管理模式可取？同样也要看哪种管理模式经济效益高来决定取舍。

2、平等观：过去人们所理解的平等是平均主义，要求的是结果上的平等；现在人们所理解的平等是机会均等，要求的是起跑线上的平等。就象在运动场上观看田径赛那样，在生活中，人们慢慢地习惯了“能者先富”的事实。反过来，过去那

种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硬要把先富者往水里拉的人现在已被安了个不那么光彩的名字——“东方式忌妒”、“红眼病”。

3、公道观：过去，干多少事拿多少钱被称之为“资产阶级的获隘眼界”，尽管多劳多得的旗帜一直打着，但是多劳可以，倘要多得就会有人鸣不平；现在，已没有多少人认为多干事多拿钱是不公道的了。

4、金钱观：过去，“钱”是个肮脏的字眼，在公开场合，大凡提到钱，总是羞羞答答难于启齿，或者“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几年，人们却不再讳言提工资、拿奖金之类的事，企业领导人用钱作为企业管理的杠杆也不再觉得良心上有什么不安了。

5、幸福观：过去的幸福观是“知足者常乐”，倾向于内在的心理平衡，以克己为途径，在思维方式上的典型表现是善于“纵向比较”、“忆苦思甜”，拿现在同过去比，在比较中获得内心的宁静和满足；现在的幸福观却似乎是“不知足者常乐”，倾向于外在的物质追求，对欲望采取相对放纵的态度，在思维方式上的典型表现是喜欢“横向比较”，拿自己同别人比，拿本国同他国比，在比较中老是感到不足。

6、道德观：过去的道德观是重伦理性道德，提倡温、良、恭、俭、让，重视团结、和睦的人际关系效应，推崇与世无争、与人为善的个人私德，它主要要求人们去做“好人”；现在的

道德观则是重进取性道德，推崇热情、勇敢、勤奋、乐观、坚韧不拔、自尊自信的品质，重视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所要求的内在征服力和创造力，它不仅要求人们做“好人”，而且要求人们成为强者，成为有用的人。这几年，应运而生的人才学在青年学生中大受欢迎，可以算个例证；描写“强者”的传记作品成为热门书籍，又是一个例证；“我为什么不是最好的？”“不愿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些外来格言的流行也是一个例证。

7、功过观：过去评价一个人，着重看动机，看态度，没有功劳、苦劳，疲劳也是资本，“无过便是功”，这同重道德、重精神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现在评价一个人，主要看效果，看他干出了多少成绩；当厂长的，不管你是满身油污还是西服革履，完成了利润指标就是好样的，否则，即使有苦劳、有疲劳，也一文不值。

8、做人的模式：不再按某种外在要求来设计自己，也不是按自己的秉性（气质、性格倾向）来发展自己了；弗洛姆所说的“买卖型”人格在我们的社会里开始增多，并不自觉地受到推崇，似乎已有不少人“具有别人会雇用的人格重要起来了”（弗洛姆语），于是我们看到，已有相当多的人（尤其是大学生）开始按照自己选定的某个社会“角色”的要求来塑

造自己了。

除了以上几种，还有其他一系列观念的变化，如英雄观、冒险观、节俭观、职业观、乡土观、时间观、知识观等等。用不着花更多的笔墨对它们一一详述，因为要认识它们的特征是容易的：它们几乎全都蕴藏着一个共同的关于明天的梦——富足、繁荣、昌盛！譬如知识观，正如过去贬低知识是由于蔑视财富那样，现在尊重知识也是由于看重了财富。不少报刊文章就是这样教人们理解“知识就是力量”的内涵；知识是人们手中呼唤财神和点石成金的魔杖；而知识分子的“升值”则是由于他们已多少向人们证实了他们是“财神爷”。

现代化作为一个价值目标本身是需要论证的，但倘若我们明确了把现代化作为现时代的主题的话，那么，强调价值取向朝外在超超型的转换就不是一个主观好恶问题，而是历史的必然。主要依据有两条：

第一，中国的生存环境是整个世界，而在这个充满着竞争气氛，甚至笼罩着战争阴云的世界里，生存和富裕几乎成了同义语，或者说，富裕是生存的前提。如果我们不把生产力的发展视为衡量一切社会决策、措施和观念之好坏的主座标的话，如果不加入世界性的物资竞赛、消费竞赛乃至军备竞赛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有可能在世界性的竞争中被“开除球

籍”。

第二，个人利益原则源于人的行为规律。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还是“经济人”，利他的感情和冲动也不是大多数人行行为的恒动力。那怕为了自身利益，只要付出的和收入的不成比例，人们也不情愿。如果秋天能收获粮食，人们是愿意春天就去耕种的，这已经是比动物要多一点聪明的远虑了。但倘若要他们等待三年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他们就不干了。智慧的贤哲们当然可以为此而感叹人性的可悲，但事实就是如此。对“大锅饭”时期的情景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如果于多干少一个样，他们宁可少干；如果于与不干一个样，他们宁可不干。因此，不顾人性的现状，不顾应人心的某种“势”来设计经济体制的动力机制，用削足适履的办法去求平等、和谐，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益，而且事实上对人们的灵魂净化也毫无裨益，相反倒是助长了人们的情性和红眼病。

迄今为止，历史的王国还是必然的王国，人们凭借自己的善良愿望和理想自由地设计历史的时代还未到来。渴望自由的人们在对未来寄予某种希望的时候，还不得不考虑它的可行性。正是由于历史规律的不可抗拒性，我们只能在几个都有缺欠的方案中选择一个，没有最优方案，只有次优方案。那种希望在各种方案中取其长处舍其短点的愿望是对历史的无知。就我国

目前情况而论，考虑到国际国内环境，考虑到人性的现状，我们只能用浓烈的色彩在理想的蓝图上突出一个主调——丰衣足食，富裕幸福。

二、人我关系：社会本位主义还是个人本位主义

从伦理学史的角度看，前面谈到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就是古老的义利之争，它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人该不该谋利？”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余下来的又一重要问题是：“应该为谁谋利？”

这是个人我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人类道德生活史上一直存在着社会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对立。

所谓社会本位主义，就是把社会或集体的利益当作个人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在道德评价上，只把那种能为社会群体带来好处的行为视为有价值的，否则是无价值的。

所谓个人本位主义，就是以行为者本人的利益作为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在道德评价上，肯定一切凡有助于满足个人需要的行为都是有价值的。

在文化形态上，社会本位主义既可以表现为国家本位主义或民族本位主义，也可以表现为集团本位主义或家族本位主义。中国的传统伦理精神是社会本位主义精神，在过去主要表现为

家族主义和皇权主义，在现代则更多地表现为国家主义。十多年前有个政治口号：“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很形象地反映了这一伦理精神。

仅仅从感情上去讨论社会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孰是孰非、孰优孰劣是困难的，由于在生活中舍己为人的行为本身就难能可贵，而且又有益于评价者，再加上我们受制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心理，因此在感情上我们极易倾向于为社会本位主义唱赞歌。

但是，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问题却不那么简单。

西方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本位主义传统，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前，却有同社会本位主义相类似的神权本位主义传统。神权本位主义把人看作上帝的奴仆，在道德评价上，同样否定那些仅仅对个人有益的行为，只把那种有助于向上帝赎罪的行为方式看作有价值的。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一大功绩是推动了文化从神本位主义向个人本位主义的转移。应当说，没有个人本位主义，就没有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事实上，撇开生产关系上的差异，仅从生产形态的角度来考察，个人本位主义本质上是现代商品经济的文化精髓（无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现代化离不开商品经济这一事实现在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商品经济较之自

然（产品）经济缺乏活力呢？大多数人还不愿意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事实上，如果人人都是真诚的社会本位主义者，他们很乐于为别人或社会工作、利他主义的动机可以成为他们的恒动力的话，那么，自然（产品）经济也未尝不能带来高效率。问题恰恰在于：既使在社会本位主义的文化氛围下，人们也不是真诚的社会本位主义者，文化的力量较之本性的力量在这里相形见绌，如果不是有为个人谋利的机会或者社会伦理规范不允许个人谋利的话，那么人们宁可什么都不干或者消极怠工。商品经济的活力源于它的体制同人的某种心理定势是一致的，它不要求人们去追求某种应该追求的目标，而是鼓励人们去追求他们实际上追求的东西。商品经济对人性的假定是：只有当人们在为自己谋福利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将潜在的活力和创造力统统释放出来。据此可知，社会本位主义的伦理精神实际上暗含着对商品经济的否定，因为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办企业，它都不允许个人（或小西体）言利，不能斤斤计较，不能搞物质刺激，甚至连订经济合同、打经济官司，都被看作是不正当的事。

此外，社会本位主义的伦理文化才会产生这样一些负作用：第一，忽视个人的自由和正当权利。在“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文化指令下，个人意愿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个人的主